

· 国外汉学与汉学家 ·

摩顿博士和他的“中国书”

李尚武

西方人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研究和传介的是一批教会人士。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学习了中文，进而认识了中国文化，并为之折服。他们回国后，将中国的许多典籍译成了西方文字，第一次引起了西方知识界的强烈兴趣和普通民众的好奇心理。正是在这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汉学才成长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欧美各国传播开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汉学的兴起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我们生活的二十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学研究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术界也随之涌现出了大批在专门领域里进行深化研究的职业汉学家。他们与早期传介中国文化的传教士们无论在治学态度或是研究方法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汉学的不断深入发展固然是令人欢欣的事情，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专家写书给越来越少的同行去看，而能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介绍中国文化的普及读物却不很常见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发现了在当今众多的汉

学家及东方学者之中，有一位传教士出身的学者，还带着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那种虔诚和执著，在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地为向大众传播他所热爱的中国文化进行着工作。这位令人敬佩的学者就是美国塞顿荷大学的名誉退休教授威·斯·摩顿博士（Dr. W. Scott Morton），《中国历史与文化》（*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的作者。

摩顿先生原籍苏格兰，1908年出生于爱丁堡。中学时期，他曾就学于爱丁堡的梅奇斯顿堡学校。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剑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希腊罗马史；他的专业研究方向是希腊哲学。由于杰出的天赋和勤奋的学习，他获得优异成绩，于1930年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回到故乡苏格兰，又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神学，潜心研究了《圣经》，包括古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古希腊文的《新约》，以及教会史等课程。在此期间，他还在1932年夏天到德国马尔堡大学访学一个学期。1933年他修完学业，获得爱丁堡大学神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旋即被苏格兰长老会教会任命为传教士，派往中国东三省传教和教书。但他来到中国之后，却获得机会，被直接派到当时北京的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学习中文，由此开始了他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摩顿先生还怀念地追述当年的情景说：“我们当时在北京有很好的老师教我们中文。其中有一位还是清朝时期在紫禁城中御用图书馆里工作过的官员。我们学习汉语会话和阅读。后来回到满洲，我仍坚持半脱产自学中文，坚持研读中国的古籍。”

在满洲工作期间，由于教会与当时日本占领军当局联系的需要，他又学习了日文，并且还到日本东京去进修了两年。这为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深入研究东方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征调到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担任随军牧师。直到

1946年，战争结束后，他才回到苏格兰，从事教会牧师工作。与此同时，他在业余时间时常举行讲座，就中国及东亚问题发表演讲，或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上发表广播讲话。1958年，他移居美国，继续担任牧师职务。

三十年代的中国经历给摩顿先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虽然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他不得已离开了中国，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研究。战后回到英国，他又多年坚持自学，还在五十岁之后重返校园，先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又到爱丁堡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及比较哲学，并以《论语》中的“君子”与西方对等的概念比较为题写作博士论文，于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1965年摩顿先生为了潜心从事中国及东亚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放弃了教士职位，在新泽西州奥林奇的塞顿荷大学应聘，成为讲授中国及日本历史的专职教授。从此，在摩顿先生的生活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摩顿先生改行教书不是对他原有信仰的放弃，而是一种新的追求。他在给笔者的来信中说道：“在我的一生中，我首先从事的是实际的工作，然后才有了理论上的思考和教学。我曾试图将西方文化传统的精髓，即犹太基督精神，向东方人进行解释和传播；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不能再回到中国工作，便决定改变一个方向，向英美人民介绍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我曾经从中国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中吸取了那样多的精神营养，我决定要和我的学生们分享这笔财富”。摩顿先生就是这样怀着对中国及东方文化的热爱，以一个文化使者的身份走上了讲台。

在大学工作期间，他除了热心教学之外，还孜孜矻矻，笔耕不辍，撰写了几本专著。其中，《日本历史与文化》(*Japan: Its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自1970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多次再版，广泛发行。1974年还出现了它的德译本，更扩大了它的读者面。同样基于他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他还著有《日

本人的生活与工作》(*The Japanese—How They Live and Work*)一书,于1973年出版。另外,他还曾被邀请参加了《世界古迹文物指南》(*World Guide to Antiquities*)的编撰工作,为该书撰写了150个词条。

1978年退休之后至今,他作为塞顿荷大学的名誉教授,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活动。除举办各种讲座之外,他还把自己在东西方哲学及当代历史等课题方面研究的成果撰写成多篇论文,发表在《苏格兰人报》、《纽约时报》及伦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学报》等报刊杂志上。1980年问世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一书则更是他耄耋之年的晚成大作。

《中国历史与文化》一书于1980年由美国纽约 Lippincott & Crowell Publishers 出版社首次发行。两年后,由于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好评,即由纽约的 McGraw-Hill 出版社刊行第二版。1986年,又有人将它译成葡萄牙语,在南美巴西发行。1995年,摩顿先生对该书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和增补,由 McGraw-Hill 出版社推出第三版。作者在写书之前曾多年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年以后又致力于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提笔撰写该书时,已是退休之后,可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集大半生的学识、思考和经验于一书,在三百页不到的篇幅内,用凝练通俗的语言向他的读者展示了他所认识和热爱的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精华。

摩顿先生治学严谨,谦虚好学。其文章的风格也一如其人。虽然在该书的序言中他谦虚地说,他的书“也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它却绝不是那种为追求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作。他写到:“我写这本书,曾经过了漫长的准备。我曾在中国住过几年。在北京和一些小城镇里,我和那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一起,往往是一连几个星期不讲英语,只讲汉语。很快地,我就被中国迷住了。我开始学习中国的哲学、艺术和历史。后来,我又多年从事教学工作,

向那些对中国完全无知的西方学生传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最后，我才决定把我一生学习、研究和工作的成果汇集成书。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向人们介绍世界民族之林中这一枝独秀的文明，也希望通过它帮助人们认识充满了生机、魅力和智慧的中国人。在当今世界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机会来真正认识这一伟大的人民。”

美国汉学界的学者们对该书作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该书极为清晰而简明地追溯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线索，重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政治、战争、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宗教、哲学和艺术诸多方面发展演变的主要轮廓。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向西方人展示了最基本的中国模式，展示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潜在的精神状态。因而，该书不但对于学习东亚政治文化艺术的严肃的学者有参考价值，而且对一般公众或旅游者来说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读者从它那儿获得的不但是知识，而且还有享受；他们从中认识的是世界伟大文明中独树一帜的中国文明。塔夫兹大学国际法及外交学教授约翰·斯本生先生热情地赞扬该书“成功地为读者在东西方思想的鸿沟之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摩顿先生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一书之所以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因为它的出现正好顺应了一种时代的需要。在过去，西方人出于无知，或一知半解，对中国有过许多陈腐的偏见：中国人不尊重生命；中国人没有个人尊严，中国的科学技术一贯落后；中文没有语法，词汇贫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现代汉学冲破了传统汉学的藩篱，取得巨大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然而，西方的汉学家们认识到，西方人要真正理解中国，仅仅抛弃偏见，采取客观公允的态度还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具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知识。中国是一个浸透了历史精神的国度，中国国情的任何一方面要是与它漫长的历史文化背景割裂开来，都不

可能被充分地理解。按照他们的说法，对中国的真正的理解更多地建立在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研究之上。特别是进入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崛起，西方出现了“中国热”现象，希望了解中国的已不仅仅是少数学者，而是包括社会各界的广大的读者群。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些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客观公允而又具有思想深度的书籍，帮助他们尽快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如前所说，当代的汉学家们虽然在许多专门领域里写作了很多优秀的著作，从多方面介绍中国。但是，过于严肃的学术性著作却并不适宜于一般的读者，不能满足这种新出现的社会需求。

1980年问世的摩顿先生的“中国书”正是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部著作。在众多汉学家用微观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时候，他用宏观的眼光鸟瞰中国。在他的眼里，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一个连绵不断、水乳交融的社会现象，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因而，他以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为线索，把文化发展的进程与之编织在一起，并以介绍文化作为全书的重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有所侧重地对文化问题进行专题介绍。例如，诗歌集中在唐朝介绍，佛教集中在六朝，科技集中在宋朝，小说集中在清朝。由于这种处理，读者在获得中国历史演变的主线的同时，又对文化的各个方面得到了简明扼要而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在宋朝一章中集中介绍的山水画便是成功的一例。在短短几页之中，作者不但对中国山水画的哲学渊源、传统技法（如升高的观测点和多角度透视法）、绘画材料、欣赏方法、知名画家，甚至少数名画都作了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介绍，而且还与西洋画的对应因素进行了比较，使西方读者能通过对比，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山水画，更好地欣赏这一独特的艺术。难怪美国著名学者，达特茅斯学院的中国哲学文化教授陈荣捷先生评价说，在西方学者写作的介绍中国山水画的著作中，很难找到象摩顿先生在几页的篇幅之内对山水

画精神所作的那样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

由于作者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西方受过教育的一般民众，他还有意识地运用了西方文化传统中惯用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术语、惯例和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解释和对比，比如“gentleman”对比“君子”，苏格拉底对比孔子，马基维利(Machiavelli)的政治主张诠释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谋略等等。正是这样，作家象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引导着他的读者，从已知到未知，认识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天地。也正是这样，摩顿先生的书对帮助西方人认识中国作出了贡献，它还必将继续作出更多的贡献。

在世界瞩目于中国的今天，中国也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需要帮助西方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然而，要真正作好这项工作却并不容易。单就语言障碍来说就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差距很大，如何才能用地道的准确的英语表达中国所特有的事物、观念和现象呢？这对专业英语工作者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更有许多学英语的大学生，虽然英语成绩可能很好，但一旦要求他们用英语谈论或写作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便常常是左右为难，不知所措。还有一些历史工作者，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英语，而不能自由地和英美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们也需要找到一条捷径，学会用地道的英语来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问题。正是对于这样的人，摩顿先生的书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他本人在写书时可能也没有预见到的一种作用：那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从另一个视角，以另一种语言来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从而帮助我们克服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语言障碍，更加得心应手、胜任愉快地进行向西方人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

笔者近年来参加对美国留学生的教学，在教中国历史文化课程时，使用了摩顿先生的著作，确实感觉获益非浅。首先是它回

答了我的许多语言上的问题。在讲解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时，有许多十分棘手的语言问题，在一般词典里都很难找到满意的答案。而摩顿先生的书却有现成的答案，而且当然都是地道的纯粹的英语。其次，他的书还帮助我打开了眼界，拓宽了视野，使我看到通过对比，才能更好地认识东西方文化，达到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的地步。根据个人切身经验，笔者相信，如果懂一定英语的中国读者能读到这本书，他们也一定会在语言和文化上获得双丰收。为此，笔者产生了撰写此文的念头，现借《文献》杂志一隅，将个人学习心得奉献给国内同好。

摩顿先生现已是高龄九旬，但依然精神矍铄，热爱生活。除了他的学术研究之外，他还爱好音乐和美术。每日的读书写作之余，他也时常在艺术的殿堂里沉思漫游。甚至在高尔夫球场上，也还时不时出现他安详的怡然自乐的身影。他过去曾参加过一些有关中国研究的学术团体，诸如伦敦的中国学会，美国的亚洲研究会，新泽西州大学教师亚洲研究会，哥伦比亚大学教师亚洲哲学及宗教研究会等。他至今仍保持着和那些热爱中国的朋友们的联系。在这些学术团体的活动中，他为帮助英美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和亚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用他一生的心血和学识为沟通中西文化编织了一条美好的友谊的纽带。那些致力于在人间消除纷争与不和，播撒理解与和谐的人们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感激的。在他们的行列里，我们要为摩顿先生毕生的追求与奉献给他献上一席尊荣的位置。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师大外语学院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